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 彭善国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陶瓷史话

宋代陶瓷的装饰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彭善国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彭善国.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7

ISBN 7-5601-2954-4

I. 辽... II. 彭... III. 古代陶瓷—研究—中国—辽代

IV.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7513 号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彭善国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黄凤新

封面设计: 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3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 9 插页: 2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4 千字

印数: 1-1200 册

ISBN 7-5601-2954-4/K · 83

定价: 22.00 元

序 一

彭善国同志的《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辽（契丹）代考古学在上个世纪中国考古学兴起之后，有着空前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对辽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作用很大。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考古学的成果尤为明显，大量的铭刻史料（包括契丹大小字的铭刻）的出土，城市遗址和陵墓的发掘，以及各种辽代遗物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辽史的史料，为元人所修的“阙略伪误”的《辽史》增添了不少新史料。关于辽代陶瓷的研究，同样也是在近五十年以来大规模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后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古代陶瓷研究，是以调查发掘历代陶瓷手工业遗迹和遗物为基础的，辽代陶瓷考古也是以这种方法进行工作的。但是，辽代陶瓷考古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现在所称的辽代陶瓷实际上是指在辽境内发现的陶瓷，它有两个来源，一是在辽境内的陶瓷手工业窑场烧造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辽产陶瓷；另一种是在辽境内的遗址、陵墓、塔基、窖藏等处发现的来自南方唐宋各窑场所产的陶瓷，是输入辽境的陶瓷。本书研究的重点是辽产陶瓷，占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输入陶瓷也很重要，它是研究宋辽交聘、贸易关系的实物。

据我所知，彭善国同志在他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由于是在职学习，既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工作，又得抓紧时间从事论文资料的搜集和排比研究；论文初稿写出后，反复修改，勤奋认

真，在学风上体现了十分严谨的态度。我认为本书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彭善国同志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从自己所作课题的研究史入手，充分掌握以往不同阶段的研究状况，给自己的研究起点定出正确位置，总结经验和教训，特别注意在方法论上保持清醒的思维方式。这是论文成败的关键问题。第二，在搜集资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从书中引用的文献来看，作者把已发表的有关辽代陶瓷的主要材料都收到了，这便给他的论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三，彭善国同志的研究方法是考古学的方法，对辽产陶瓷作类型学和分期的研究，并注意窑址发掘中所见的辽瓷烧造工艺的遗痕；对唐宋输入瓷器则依窑口及时代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输入的窑口比例及其与当时宋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

从陶瓷器的生产和形态功能上来探讨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事物，无疑是研究中国陶瓷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阐述。但是，对契丹早期尚处于游牧生活阶段的那种印纹陶器，本书中没有涉及，作为探索契丹早期文化的陶器，似乎也应予以注意。

本书在研究辽代陶瓷考古方面，是我所见到的最新的成果。我希望彭善国同志能继续在辽代考古学上作出更好的成绩。

徐 芳 芳

2003 年 6 月于北京

序 二

1992年彭善国同志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毕业后，由于其学习优秀，被保送作我的免试研究生，系里还决定他研究生毕业后留下作教师，准备承担考古和博物馆专业的宋元考古基础课和指导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宋元考古中，瓷器研究是重要的内容之一，所以系里还安排他为陶瓷考古专业课作准备。正因为如此，他的硕士论文被定为“北方地区金元瓷器的初步研究”。通过论文写作，他对北方地区金元瓷器的主要窑场、类型、装饰、工艺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探讨。在此期间，1993年下半年我派他到北京大学，由权奎山先生带领指导，参加了江西洪州窑的发掘。1994年上半年，他继续在北京大学进修，听了徐莘芳先生给北大学生讲授的宋元考古课。

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彭善国同志对陶瓷研究的兴趣有了很大提高，并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1997年他考取我的博士生，打算进行辽代陶瓷方面的深入研究。因为我对陶瓷研究和辽金考古并无专长，于是便想请徐莘芳先生出面指导。徐先生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而且年龄也大了，开始我还有顾虑，但是当我把此想法提出后，他欣然答应。徐先生说：“我是吉林大学的兼职教授，这是应当做的。”听后，我和彭善国都非常感动。之后，关于彭善国同志的课程安排、论文的选题、写作提纲的确定，以及最后论文的修改和定稿，徐先生都亲自把关，作了大量工作。在这当中，由于徐先生太忙，无时

间到吉林大学来，所以校内彭善国的日常课程和论文写作之事，则由我负责。在此期间，通过和内蒙联系，彭善国同志于1998年夏天参加了赤峰缸瓦窑的发掘和整理，之后，他还多次到当地考古工作站观察和研究标本。2001年冬，彭善国同志博士论文答辩，学科学术委员会请徐先生主持，徐先生也高兴答应了。不巧的是，那天北京下大雪，路上严重堵车，徐先生提前几个小时从市内出发，结果到机场还是没赶上飞机。但是他从北京打来电话，将他的意见及时告诉答辩委员会，保证了答辩的顺利进行。

彭善国同志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辽境出土瓷器研究”，这就决定了其研究内容既包括本地的辽产陶瓷，同时也包括从中原、南方输入的陶瓷；由此反映的问题中，既有本地经济的发展，又有同中原、南方的交流。对此，该论文都予以充分注意，即以本地辽产陶瓷为主，将本地瓷和输入瓷分章进行了研究，清楚明白。因为是考古论文，所以收集的资料全是从窑址、墓葬、塔基、城址、窖藏中出土的，这就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研究的手段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为主，在对本地辽产陶瓷的釉色、形制和纹样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分析之后，又结合辽墓分期，对本地辽产陶瓷作了恰当的分期，总结出各期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徐先生建议出版将书名改为“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的确是很切题的。

彭善国同志思维敏捷、学习认真，事业心强，迄今他在陶瓷考古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希望他以此为基础，继续努力，并向相关方向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徐存成

2003年6月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绪言	(1)
第一章 辽代陶瓷发现简况与研究述评	(3)
第一阶段：20 世纪初至 1949 年辽代陶瓷的发现	(3)
第二阶段：1949 年到 1972 年辽代陶瓷的发现 与研究	(5)
第三阶段：1972 年至今辽代陶瓷的发现与研究	(7)
第二章 辽代窑址及制烧工艺	(33)
一、窑址的分布格局	(33)
二、窑址及相关问题	(33)
三、制烧工艺的总结及与五代北宋的比较	(48)
四、辽代陶瓷手工业性质分析	(51)
五、林东窑年代问题的讨论	(57)
第三章 辽产陶瓷的类型	(63)
一、釉色品种及相关问题	(63)
二、形制分析	(76)
三、主要纹样题材	(178)
四、辽产陶瓷类型总结	(187)
五、辽产陶瓷类型的文化因素	(188)
第四章 辽产陶瓷的分期与讨论	(194)
一、辽墓的分期成果及既往辽产陶瓷的分期结论	(194)

二、分期及各期特点	(197)
三、各期反映的历史问题	(201)
第五章 辽境输入瓷器研究	(208)
一、输入瓷器的具体分析	(208)
二、瓷器输入之途径与辽五代北宋间的交流	(251)
三、输入瓷器的消长变化及相关问题	(256)
第六章 结语	(261)
附录	(264)
插图索引	(264)
表格索引	(268)
后记	(271)

绪 言

本书是对辽代陶瓷的考古学专题研究。

辽（公元 916 ~ 1125 年）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按照《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其统治的地域虽然说“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拒马河），幅员万里”，但境内陶瓷器主要发现在辽上京道南部、东京道西部、西京道东部、中京道和南京道（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辽宁吉林两省的中西部、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和京津地区），以窑址和墓葬出土数量最多，其次是塔、城址及个别窖藏。20 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及内蒙的盗掘为辽代陶瓷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线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随着辽代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辽代陶瓷的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使这一陶瓷史上的薄弱环节既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又有深入综合的必要。

辽代陶瓷按照产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辽本土窑场烧造的产品，本书称为“辽产陶瓷”；另一类是来自辽境以外的窑场的产品，本书称为“输入瓷器”。本书的研究就是以这两部分为切入点展开的。

辽产陶瓷的研究部分一是具体分析了已发现的辽代窑址，主要是其中目前发掘比较充分的缸瓦窑、龙泉务窑址和界庄窑；在探讨辽代窑址的制烧工艺时将诸技术因素（窑炉、装烧具等）与五代北宋窑址作了对比分析；结合文献尽可能地探究了辽代窑场的生产性质（官窑还是民窑）问题。二是详细研究

了辽产陶瓷的类型，即釉色品种、器物形制及装饰花纹，分析了各釉色品种和主要装饰花纹的流行时段，确立了主要器物形制的编年，对釉色品种中颇具特色的辽三彩及以往被认为是辽产陶瓷的釉下黑花器分别作了深入探讨和辨证；对辽产陶瓷类型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也作了初步分析。三是在前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辽墓已有的分期成果，将辽产陶瓷分为三期，总结了每一期的特点，并对分期所反映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如上三方面的研究力图复原辽代陶瓷手工业的整体面貌。

输入瓷器的研究部分一是通过对比，系统、具体地探讨输入到辽境的各个窑口（邢窑、越窑、定窑、耀州窑和景德镇窑）的瓷器。二是结合文献从总体上探讨了瓷器从五代北宋输入至辽的可能途径，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辽与中原南方五代北宋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三是分析了输入瓷器中各窑口所占的比例及在不同时段的消长变化，由此进一步探讨了各窑的发展状况及其产品具体输入辽境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辽产陶瓷中的陶器不代表辽代陶瓷手工业的主要成就，釉陶质的建筑构件（如砖瓦等）材料尚不系统，这两方面暂不列入研究范围之内，仅作为研究的参考。此外，出土情况不明确的陶瓷器在真伪问题搞清之前不属于本书的范畴，也只作研究的参考。

第一章 辽代陶瓷发现简况与研究述评

辽代陶瓷的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 20 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为肇端，主要是日本人对辽代窑址、辽墓、辽城的盗掘及对出土陶瓷器的劫掠；1949 年到 1972 年是辽代陶瓷资料的初步积累与初步的综合研究阶段，主要是辽代窑址的调查，此外，经过科学发掘的辽墓也出土了不少陶瓷器；1972 年至今是辽代陶瓷出土日渐增多且研究趋于深入的阶段，主要是较大规模地发掘了辽代的窑址，同时辽墓、辽塔出土陶瓷器的数量也有很大增加。

第一阶段：20 世纪初至 1949 年 辽代陶瓷的发现

辽代陶瓷窑址与陶瓷器的发现始于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及内蒙古进行的所谓考古活动^①。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就注意到辽宁辽阳太子河畔的江官屯窑址且进

^① 魏建猷：《日本鸟居龙藏氏调查热河省境契丹文化的经过》，《燕京学报》第 15 期，243～253 页；1934 年；冯家昇：《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第 19 期，173～196 页，1936 年。

行了挖掘与破坏^①。1939年，田村实造在调查庆陵时，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发现了所谓的上京临潢府故城内官窑（即林东窑），采集到黑白瓷片若干。1944年，小山富士夫等人调查并发掘了该窑址^②。1942年，一日本僧人在内蒙古赤峰西南猴头沟村的缸瓦窑屯发现一处陶瓷窑址并采集了许多瓷片，这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次年，伪奉天博物馆馆长上原之节及斋藤武一等前往调查，对该窑址遗物的分布范围、瓷片的种类及窑具等有了初步的认识。1944年，东洋陶瓷研究所的小山富士夫、黑田源次、上原之节等组织了缸瓦窑的发掘。参与挖掘的中国学者之一的佟柱臣先生在当年的《盛京时报》上就此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情况发表了简要的报道^③。

除了盗掘辽境陶瓷窑址外，日本人还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内蒙古等地大肆挖掘辽代墓葬和城址。辽的帝陵庆陵及其奉陵邑庆州、祖陵的奉陵邑祖州等都遭到他们的盗掘。此外，他们盗掘的较重要的辽墓还有内蒙古巴林左旗四方城辽墓、辽宁建平叶柏寿车站辽墓、建平张家营子辽大安六年（1090年）郑恪墓等。一些日本学者如小山富士夫^④、岛田贞彦^⑤等开始尝试对这些墓葬和城址出土的陶瓷器进行粗略的分析。

日本人对中国东北及内蒙古包括古代瓷窑在内的文物古迹的染指，带有其文化侵略服务的色彩，而不是出于学术探研的目的。他们对窑址、墓葬、城址的非科学、非系统的大肆挖

① 李文信：《日寇在东北文化侵略的罪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9），212～213页。

② 参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座右宝刊行会，1953年。

③ 佟柱臣：《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发掘通讯》，《盛京时报》1944年8月18日至8月20日连载。

④ 小山富士夫：《满蒙遗迹出土的陶片》，《陶器讲座》12卷，1936年。

⑤ 岛田贞彦：《鸡冠壶——考古随笔》，满州时代社，1944年。

掘及对挖出陶瓷器的劫掠使中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尽管他们的盗掘为辽境陶瓷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线索，但这一学术课题只能在荼毒之劫余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伤心之事。

日本人盗掘劫掠的同时，中国学者李文信等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搜集整理辽境出土的陶瓷器。到解放初的 1951 年，沈阳东北博物馆辽产陶瓷的收藏已达 300 余件^①。这意味着文献记载极少的辽产陶瓷的探究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阶段：1949 年到 1972 年 辽代陶瓷的发现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包括窑址在内的文物古迹普查纷纷展开。1958 年调查发现了北京门头沟区的龙泉务窑址。为了弄清辽中京发掘出土瓷器的产地，贾洲杰于 1964 年夏调查了内蒙古的赤峰缸瓦窑，调查材料 1974 年发表^②。1954 到 1964 年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还调查了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窑址、巴林左旗白音高勒窑址、小辛地南山坡窑址等^③，可惜详细材料至今没有发表。这一阶段对于辽境窑址仅有调查，尚未进行考古发掘，因此无法确定窑址的确切内涵及采集到的标本的具体年代。40 年代由日本人操纵调查挖掘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所谓的辽上京故城内瓷窑、上京南山窑址、林东白音

① 李文信：《东北博物馆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9），79～95 页。

② 洲杰：《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4），241～243 页。

③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69～83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

高勒窑址的报告则由李文信先生在 1958 年发表^①。

这一阶段辽代陶瓷的发现主要集中于墓葬（参见本章表 1-1）。出土陶瓷器较多的辽墓有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群（1950 年发掘）、内蒙古赤峰大营子驸马墓（1954 年发掘）、辽宁新民巴图营子墓（1956 年发掘）、赤峰大窝铺墓（1957 年清理）、辽宁锦西孤山萧孝忠墓（1958 年发掘）、内蒙古宁城小刘杖子墓地及尚疇墓（1959 年发掘）、河北迁安韩相墓（1964 年发掘）等。墓葬所出既有辽窑址烧造的粗细白瓷及釉陶，也有中原南方五代北宋窑址烧造的瓷器。

与第一阶段日本人以劫掠文物为目的的盗掘相比，这一阶段辽墓的科学发掘丰富了辽代陶瓷的内容，也使对辽代陶瓷的科学探研得以展开。后者主要体现在对辽产陶瓷的综述及由新发现所引发的研究上。在这两方面都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李文信先生，凭借他解放前田野工作的基础，早在 1951 年就对辽产陶瓷作了初步总结：将辽产陶瓷分为三类；溯其造型渊源有二^②。这些思想在他后来的一些论著，如《辽瓷简述》（1958 年）^③、《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1961 年）^④ 等中得到进一步地阐述或修正，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辽产陶瓷研究的基调。日本学者杉村勇造在黑田源次遗稿的基础上，结合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一些发现，对辽产陶瓷进行了粗略的总结^⑤。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的瓷器》也曾

① 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2），97～107 页。

② 李文信：《东北博物馆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1（9），79～95 页。

③ 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10～22 页。

④ 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编后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年。

⑤ 《陶器全集》第 14 卷，辽的陶瓷，平凡社，1958 年。

列专节介绍辽产陶瓷^①，但内容不超过李文信先生的论述。

由于赤峰大营子驸马墓出土了带“官”字铭文的瓷器，一些学者开始讨论辽代的官窑问题。金毓黻结合宋人奉使行程录中“官窑馆”的记载，认为凡“官”款白瓷并包括其它白瓷在内都是辽官窑产品^②。陈万里则认为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有可能来自河北曲阳定窑，“官”款白瓷是否就是文献上的“官窑馆”的产品尚待进一步的研究^③。此外熟稔越窑的陈先生还指出大营子驸马墓出土的越窑瓷器是辽与吴越政权往来的具体物证^④。

第三阶段：1972 年至今 辽代陶瓷的发现与研究

从 1972 年至今这 30 年间辽代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情况可以概述为如下三个方面。

1. 复查了若干瓷窑遗址，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的窑址，一些重要的窑址得到较大规模的发掘。

辽宁省文物工作队方殿春于 1975 年，冯永谦于 1977 及

① 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132～135 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 年。

② 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4），1～4 页。

③ 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的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11），15～16 页。

④ 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的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11），15～16 页。